

妥善處理兩地融合激起的漣漪

潘佩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實事廖事

兩地一些衝突矛盾，可以視作為兩地經濟、文化融合過程中濺起的浪花漣漪，本來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如果處理不善，確實會對民生帶來衝擊，令不滿的情緒滋生，影響社會穩定。我們寄望特區政府，盡快就兩地融合產生的問題，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研究，然後落實解決。兩地融合，是歷史的大潮，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我們不應有因噎而廢食的思維，而是應該以更積極、更主動的態度，解決難題，使融合更能體現群眾的利益，更能得到群眾的支持。

最近，內地與香港族群間的矛盾，有漸見激化的跡象，在互聯網上，最熱門的辯論議題，莫過於有關內地旅客的一些較具爭議性的行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名店歧視事件、生活必需品如奶粉被內地客搶購一空等等。一時間，你「敬」我一句「蝗蟲」，我回「敬」你一句「狗」，唇槍舌劍，火花四濺。

包容看待兩地文化差異

造成這些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內地和香港兩地由於歷史原因，在不論文化、風俗方面都存在一些差異，本來西方人的風俗習慣也和港人大異其趣，但香港長期與西方接觸，對於西方人的行為，一般也比較認識和包容；反而對內地同胞，就用香港人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因此覺得很不以為然。第二個原因是市場供求失衡，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本地市場原來就不大。如今湧來大量消費力極強，購物

花錢動機同樣強的內地客。他們的消費，固然為香港帶來了無限商機，也創造了大量服務業的職位，但同時也把物價拉高了。別的不說，單就舖租一項，在過去一年間，部分一線舖位租金升幅竟然超過一倍，令人咋舌！此外，內地人熱衷在港置業，令本來已經短缺的住宅樓更加供不應求，成為前一陣子推高香港樓價的一個原因。此外，部分商品的供應，一時間未能及時應付強大的需求，因而出現暫時的短缺，這些關乎民生的必需品一旦出現短缺，就很容易引起恐慌，前一陣子奶粉短缺就是一個例子。當然，還有個因素是部分媒體的炒作，部分媒體將兩地民眾的矛盾擴大，加深了市民的誤解，也激化了對立情緒。

宏觀而論，這些衝突矛盾，可以視作為兩地經濟、文化融合過程中濺起的浪花，本來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如果處理不善，確實會對民生帶來衝

擊，令不滿的情緒滋生，影響社會穩定。過去，政府為應付兩場經濟危機，所思所想的，都是如何搞旺搞活香港的經濟，對於搞旺經濟之後可能產生的問題，確實沒有作好準備，以致問題發生後，才急急找尋解決方法，非常被動。

以更積極的態度解決難題

預防總勝於治療，與其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我們寄望特區政府，盡快就兩地融合產生的問題，不論是已見的，還是未發生的，都要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研究，然後落實解決；對於香港特區無法獨力解決的問題，應提請中央政府協調，然後就

這些問題和內地地方政府磋商解決和預防的方法，並落實執行。

香港和內地融合，是歷史的大潮，符合香港和內地同胞的根本利益，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我們不應有因噎而廢食的思維，而是應該以更積極、更主動的態度解決難題，使融合更能體現群眾的利益，更能得到群眾的支持。



■大量消費力強的內地遊客來港，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和大量就業機會。

食物捐助需全民參與

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財政預算案公佈增撥一億元延續「食物銀行」。有關計劃應進一步擴大，成為全民參與活動。

過去數年，通脹升溫，「食物銀行」協助不少基層市民渡過難關。據統計，「食物銀行」協助的人數由2005年的7000多人，急升至2011年7月底的5.8萬人。傳統上，在華人社會領取食物援助是讓人感到羞愧的事情，但是仍有大批人士領取，可見香港社會有不少基層市民生活在三餐不保的邊緣。

雖然政府預計隨着環球食品和商品價格下降，加上香港經濟增長減慢，基層市民面對的通脹壓力有望減輕，但是隨着節日過去，商業活動減少，以及外圍經濟環境欠佳，未來失業率可能回升。政府應密切留意情況，隨時再向「食物銀行」提供資助。必須強調，「食物銀行」設立的目的並不是鼓勵基層市民依賴社會，反而是通過過短期的食物援助，讓基層市民渡過難關，鼓勵其自力更生。

「食物銀行」本身非謀利，需要不斷尋找捐獻。它除了尋求政府資助外，還應盡力呼籲社會大眾捐獻，發揮互助精神，形成全民參與的活動。「食物銀行」第一步可考慮與學校合作，發起募捐和招募義工的運動，培養家長和學生珍惜食物的意識，減少浪費。另外，部分食品企業主都有能力提供協助，只是擔憂其食物接近保

質期的完結，可能損害食用者的健康，甚至要負上法律責任。就此，「食物銀行」需考慮更多方法以服脫這些企業主。「食物銀行」也可鼓勵更多曾受助但走出谷底的人士擔任義工或捐獻，進一步發揚互助精神。

現時，部分「食物銀行」也與政府或超級市場合作，推出食物券計劃。該計劃可讓受助者購買凍肉、蔬菜、生果等新鮮食物。而且，「食物銀行」不是各個社區都設有，居所遠離「食物銀行」、行動不便的基層人士可不受地區限制，憑食物券到附近的超級市場選購。有關計劃應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大型連鎖商店和食肆，方便受助者，讓他們有更多選擇。

「食物銀行」也可鼓勵商店推出助人計劃，例如超級市場可以把未能賣出但保質期接近完結的貨品，放在特定紙袋，以較低價錢售出。顧客可即時購買，並捐給「食物銀行」。

當然，「食物銀行」並不能消除貧窮，只能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根據統計處的最新數字，過去十年，每月收入少於4000元的家庭由16.3萬上升至21.4萬，升幅達31.3%，遠高於同期家庭數目上升的15.4%。每月僅憑4000元以下的收入，以維持家庭成員進食健康食物，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基層市民依靠「食物銀行」只是權宜之計，政府必須考慮更多方法協助這批家庭擺脫貧窮。

止戈為武

近日，一則新聞短消息引起了中外軍事觀察家的注意：據《解放軍報》報道，中國武警交通部隊完善管理體制工作實施計劃已正式啟動，其中國家交通運輸部由過去對武警交通部隊的業務指導關係，調整為業務領導關係，直接負責交通部隊應急救援行動指揮、工程建設任務下達；國家交通戰備辦公室對武警交通部隊擔負的軍事交通保障相關業務工作實施指導。交通運輸部部長、武警交通指揮部第一政委李盛霖出席了武警交通指揮部黨委四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要求各級領導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進一步完善武警交通部隊管理體制的決策部署，確保部隊順利轉型、平穩過渡。武警交通部隊發言人宣稱，中國武警交通部隊管理體制、職能任務的調整轉變，標誌着中國武警交通部隊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武警交通部隊作為解放軍的一個特殊兵種，其管理體制變動雖不像主戰部隊那樣令人關注，但透過任務轉變和建設轉型，可以感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高層堅持推進軍隊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感悟軍隊改革注重頂層設計、統籌協調和穩步實施的方略和穩妥，對打造一支过硬的應急救援精銳之師和現代化交通部隊充滿了期待。

調整轉型頗有看點

一是領導關係更加順暢。武警交通部隊的前身是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成立於1966年8月1日，當時是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為加快全國基本建設步伐，決定採取「兵役制」來解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施工中地方施工隊伍無法完成的急難險重任務。毛澤東主席親筆批示「這個辦法我贊成」。在1985年全軍百萬大裁軍中，為保留這支有生力量，黨和國家決定將基建工程兵編入武警部隊序列，改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交通指揮部（軍級），由公安部和交通部實施雙重領導。1999

年2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命令，調整武警交通部隊領導管理體制，改變為武警總部統一領導管理，交通部負責武警交通部隊任務分配、業務指導。2009年7月，交通部隊被納入國家應急救援力量體系，由武警總部和國家交通運輸部雙重領導。觀察家認為，近年來武警交通部隊憑借自身優勢，出色完成了一系列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搶險救援任務，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但在宏觀上也暴露出管理體制不順，領導和指導關係上「缺位」、「越位」和「扯皮」等問題。這次調整改革，將國家交通運輸部由過去對武警交通部隊的業務指導關係，調整為業務領導關係，明確負責交通部隊應急救援行動指揮、工程建設任務下達，並且交通運輸部部長繼續兼任武警交通指揮部第一政治委員，這就較好地解決了武警交通部隊上接「天氣」、下接「地氣」的問題，從管理體制上解決了平時業務領導和應急使用時的指揮協調問題，為武警交通部隊有效履行自身使命奠定了組織基礎。

二是基本任務更加明確。據介紹，調整轉變後武警交通部隊的基本任務主要是擔負因自然災害、恐怖襲擊和戰爭等因素導致損毀的公路、橋樑、隧道、機場、港口等交通設施搶修搶建任務，重要國邊防公路養護保護和重要公路橋隧管護任務；承擔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需要的特殊工程建設等國家指令性任務。觀察家指出，改制後交通部隊的基本任務，凸顯了國家需要和戰備保障的特色，明確了服務國家經濟建設和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職能定位，進一步明確了其在基建市場上特殊的國家隊定位。

三是聽黨指揮更加得體。觀察家注意到，武警交通部隊管理體制調整後的軍事、政治、後勤工作仍由武警總部實施統一領導，其中師職以上幹部須報中央軍委任免，這就保證了軍事改革必須同時滿足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適應未來戰爭需要兩項條件，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篤行

一宗又一宗有組織有預謀衝擊香港司法制度和香港福祉的案件，擺佈綜援受助人以法援公帑以司法覆核手段挑戰政府行政，阻礙施政和社會發展，均與公民黨有着千絲萬縷的不尋常關係。然而，訟棍卻毫無悔意，最近又嘗試以「自駕遊」、「補選方案」、「雙非嬰」等議題分化社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測試港人的底線，我們必須果斷地以選票把禍港訟棍掃出議會，否則訟棍只會變本加厲，發動更多官司來擾亂香港的安寧和法治。

惹起全港哄動的「外傭居港權」上訴案，引起各界關注，有網民自發性在審訊期間在高等法院外發起抗議示威，以表示對「外傭居港權」案事態發展的關注。

外傭湧港香港難以承受

眾所周知，若果政府在此上訴案件未能成功翻盤，很可能意味着全港近十二萬已在港居住滿七年的外籍傭工，可以即時享有申請居港權的資格。這數字並不是危言聳聽。這還未包括他（她）們隨後以團聚等理由從



■本港工會代表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

原居地申請家人配偶等來港，若果一時間外傭成為港人，則有資格去申請綜援、房屋、醫療、教育等福利，分薄香港社會資源，對香港資源構成預計以外的沉重負荷；而且，外傭屆時更可以與本地人爭奪跨行業的工作機會，直接打擊飲食業、零售業、文書處理、旅遊業、清潔工、甚至教育界的飯碗，官司勝負影響深遠。

案件代表外傭一方，正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資深大律師李志喜，該黨亦自知在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抨擊後，難辭其咎，為怕影響去年底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和今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其黨魁立法會議員梁家傑竟指鹿為馬，辯稱外傭的「申請居港權」並非「居港權」；亦拋出「入境處的四個關卡」謬論，企圖迷惑和誤導港人。其實，屆時總會有人走出來再以司法覆核來挑戰該四

燕南

去年香港接連發生土瓜灣及花園街四級大火，導致十數人死，上百人傷的嚴重事件。事件暴露了近年來越來越多劏房所帶來的隱患，以及潛在的危機。政府事後對全港部分劏房進行了巡查，並對個別工廈、高危劏房限時封拆。這些措施無疑對規管劏房產生正面影響，但面對香港有眾多低收入人士租住不起高價房，更無力置業的現實情況，價錢廉宜的劏房不啻是個現實的選擇。

住房緊張劏房有市

為什麼劏房能夠大行其道？其實劏房是市場的產物，早在七十年代已經有之，大多位於市區。劏房或因源於市場對市區廉價住宿的需求。因為市區是商業、娛樂、零售、餐飲，甚至政府機構的中心，這裡交通方便，亦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所以，交通費用低，上下班省時，就業機會大的市區便成為大多數人居住、生活的首選。但世事是雙面體，方便、省時、就業易的市區住屋自然也寸土寸金，一個500呎的八年樓，至少要售五、六百萬。就是租也要一萬三、四千元，不是個個都買得起、租得起的，於是一些有生意頭腦的人，便打起了一改二或一改三的變舊通房為劏房的主意，其回報率自然也大大提高。

據業內人士透露，現時市場上一般私樓出租回報率不足四厘（供樓與出租比），而改為劏房的出租率卻高達七厘。同樣一個500呎的樓，如全套租，只能租到一萬多元，如改為5間劏房，每間四千元，可租到二萬元。如果改造幾十年的舊唐樓，或者工廈房，其利潤更加高，令到不少投資者

處理劏房不可一刀切

花一、二百萬元買一個舊樓單位，再以一割三或一割四方式租出，租金回報率至少有四厘多。所以香港的劏房就愈來愈多。

劏房最受新移民歡迎

香港的劏房不僅受一眾不願與家人同住，食方便、自由的小白領青年一族歡迎，更是新移民們來港落腳定居的首選住所。

早在七八十年代，隨着內地改革開放，一些香港有直系親屬的內地人，尤其是廣東、福建農村一帶的農民，紛紛獲批來港會親定居，由於這些人的在港親人大多文化低工資低，因而租不起貴租房，更買不起私家樓，因此多以租間劏房（當時叫板間房）安排妻兒暫住，再慢慢等待公屋。所以來香港的新移民，除個別有錢、家境好的一來香港就可以住大房、洋樓外，大多數都住過劏房，那時的劏房多位於北角、深水埗、荃灣等，而市區的中環、灣仔、銅鑼灣、東西區，尤其是南區就極少，而工廈改造的劏房更少有聽聞。近年來隨着新移民的增多，尤其是單身男女的增多，令到劏房的需求日見增多。據報道，觀塘竟然有人將貨倉改造為30至40呎大小的迷你倉，以月租400-700元租給單身人士，由於貨倉白天不可以住人，所以一到夜深人靜，就有人悄然而入與貨共眠，顯見香港底層貧困一面。儘管只能夜半同貨同眠，但許多入住者卻隨遇而安，更擔心當局如封拆，他們會夜無安身之地，因為他（她）們大多為新移民，既無資格上公屋樓，又無錢租貴樓，月租幾百元是他們的最好選擇。由此看來，劏房確有存在

的價值與需求。

取締劏房要有配套

我們應該承認市區廉價住宿的市場需求。劏房本身並不是問題，破壞建築結構和防火等安全設施不足才是問題之所在。所以，筆者在支持政府加大力度規管劏房防患於未然的同時，對劏房更應該分別對待，切切不可一刀切，對於那些高危及暫建劏房，尤其是工廈改造的劏房，應毫不手軟的加以封拆取締，但對無太大潛在危險又依足防火等安全措施的劏房，除需加強管理外，應予以保留，以紓緩社會矛盾。

另外，無民居安全保障的工廈劏房其潛在危險較大，政府應嚴加控制，但在採取取締行動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到相關配套加以妥善安排，例如房委會有否足夠的公屋單位安置他們，雖然關愛基金有撥款給受拆遷劏房住戶提供一次性補貼，但因工廈劏房租平，這些人改住貴租房生活水準難免受影響，最近更有受封拆影響而轉住樓梯的個案。所以相關措施與配套至關重要，最好的辦法，還是從源頭做起，那就是一方面立法禁止改建不符民居標準的工廈劏房或危樓劏房，並對合標準的劏房嚴加監管；另一方面可考慮在市區增建價廉方便，類似可租可買的青年居舍。當然，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就是政府必須加大加快舊區的重建規模與速度，同時還要兼顧到重建後的交通配套與營商環境，如土瓜灣、紅磡、十三街等社區，如果將該些舊區規模化、合理化進行重建，並有效配套方便市民，相信劏房的問題會得以有效紓解。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